

严复林纾

诗文选译

● 马克锋 ●



巴蜀书社



严复林野

诗文选译

（马 国 群 著）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严复林纾诗文选译

马 克 铎

巴 蜀 书 社 中国·成都

特约编辑：邓元煊

责任编辑：王大厚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严复林纾诗文选译

马克锋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7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I·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悱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1914年，严复六十岁大寿，林纾作《严几道六十寿作此奉贺》诗，对他的学识与著译予以高度评价。到了1921年，林纾七十大寿，严复作《赠林畏庐》七律一首，表示祝贺。不久，严复病逝，林纾写《告严几道》悼文，对严复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并发出了“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至可哀也”的感叹。其实，严、林交谊不仅仅在晚年。1904年，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严复就曾写诗庆贺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严复与林纾不但在翻译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诗文等创作上也显示了各自的才能，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在这里，我们分别来考察一下他们的著译，并予以适当的评价。

严复（1854～1921），初名体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改名复，字几道，晚年号愈野老人，福建闽侯（今福建福州）人。他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的思想家、翻译家，而且也是一位散文作家和诗人。他的政论、译作和诗文

在当时社会上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严复的父亲严振先是位乡村中医。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他不能像当时富家子弟一样，走科举入仕的正路，所以考入洋务派官僚左宗棠、沈葆楨等创办的官费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他是该学堂的优等生，五年后毕业，在军舰上实习，1877年又被派到英国海军大学，在那里留学将近三年。在此期间，他考察了英国社会，研究了西方思想，奠定了他西方文化学术方面的坚实基础。回国后，在福州母校教了一年书，就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去，在李鸿章新创办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里任职，自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升至总办（校长）。任事凡二十年。在他身后，陈宝琛作《严君墓志铭》说：“文忠（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严复）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这说明李鸿章对严复是不重用的。但同时，我们从各种史料中知道，严复对李鸿章也很不满意。他不相信李鸿章举办的边缘性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而始终认为，必须全面地、从根本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而免于灭种亡国。这是严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他刺激很大。甲午至戊戌这三年（1895～1898）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就在这个时期成为提倡变法自强的著名理论家与宣传家。他通过发表文章，译著《天演论》，创办报纸，全面展示了关于挽救危亡，振兴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主张。1895年，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四篇重要论文。这四篇论文中，《原强》是最主要的一篇，因为这篇论文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其余三篇，都可以说是这一篇论文的补充和

阐发。后三篇文章中《辟韩》一篇特别重要，因为这篇文章对皇权政治与专制文化进行了最尖锐、最严厉的抨击，并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己所相信的民主思想。所以，如果我们要从严复生平所作的全部文字中，选择一两篇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对历史起过进步作用的文章，那么，应首推《原强》与《辟韩》。譬如在《辟韩》一文中，他尖锐地批判了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原道》中维护君主专制的理论：“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直指国君都是窃国大盗，“国维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无怪当时颇有权势并且以一代儒宗自居的张之洞要弹劾他。这表明严复是具有一定胆识的。1897年11月，严复与他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其中主要社论，大多出于严复之手，其文章仍然坚持以往尖锐泼辣的风格。严复深知，这种尖锐泼辣的文字，会得罪许多人，但他宁愿“就吾见闻，敬告天下”，也不写八面玲珑的文章。如果一定要八面玲珑，讨好当局，“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严复晚年在给他门生的信中说：“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这确实是严复当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严复陆续发表的论文，已使他成为全国的知名人物。但当时影响最大，使他最负盛名的，还是他译作的一本书——《天演论》。《天演论》的原本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可以说，进化论之输入中国，是从严复开始的。

赫胥黎的基本论点是：生物是进化的，不是自古不变的。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就是“物竞”与“天择”。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赫胥黎认为，这

种生物的发展规律,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同时,他又强调社会不应当被动地顺从于“天演”,而是以伦理的进步扼制“天演”,“以人持天”。严复就是用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向全国民众敲起危亡的警钟。于是他译作了《天演论》这部书。

《天演论》译成出版后,立刻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桐城派末代文人吴汝纶极赞《天演论》的议论之精,文辞之美,谓其简直如“刘先主之得荆州”。至于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对之称叹不已。梁启超一直钦佩严复,也是最早读《天演论》译稿的人。《天演论》还没有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根据《天演论》做文章了。康有为一向是目空一切的,但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承认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严译《天演论》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而且还进一步影响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大批思想家,如胡适、鲁迅等人。

戊戌变法遭受顽固派的镇压后,严复的心情是沉痛的。“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两句诗正可表示他对戊戌六君子就义及光绪被囚瀛台的无限愤慨。由于严复没有直接参与变法活动,所以他没有受到迫害。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严复从此脱离天津水师学堂,南北奔走,随处谋职。他先后在上海开会讲学,任开滦煤矿华人总办、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译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但总的说来,他对于这些工作,都未尽力为之,其精神所寄,仍是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从1898—1911的十三年中,其最大精力在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为中国人输入西方

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令人耳目一新。严复翻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并首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准则，对后世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影响深远。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上过的是养病闲居的生活，尽管在报刊上或书札中还经常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列名“筹安会”，为发起人之一。这虽然是“颇缘被动”，但他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却是自认不讳的。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给门生的信中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挥淘炼而已。”^①晚年的严复变成了一个保守的老人，于1921年逝世。

严复的散文，主要是政论文。在古代的文学论里，政论文一直被认为是散文的一个重要部分。本书选译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都是震动一时的名文。这些文章，既是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提倡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主张变法图强的战斗檄文，又是笔端带有情感，反复申述，夹以比喻，间以问答，中西对照，新旧比较，骈散合一，以散为主，很能激动人心的具有文学性的散文。从他的政论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爱国心，他对于祖国危亡的担忧和对于顽固派的愤慨。他的政论反映出他的精神风貌，是有激情的，是进取向上的。

严复的诗结集成《愈野堂诗集》。文章宗马、班、韩、柳，诗

① 《严复集》第3册，668页。

仿屈、宋、李、杜，其中又最为推崇杜甫。风格沉郁顿挫，叙事抒情真切，语言朴实典雅，平实严整，借以抒发个人的忧愤，反映社会的黑暗。“岂不爱国种”，“欲往无轻舟”——这两句诗，反映了一代思想先驱最终未能挣脱旧基地的苦闷。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又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冷红生，晚称蠡叟、补柳翁、长安卖画翁。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

林纾的生平和思想，大致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辛亥革命前是他进步的时期，辛亥革命后思想日趋保守，最终成了旧文化的代表人物。

林纾从小勤奋刻苦，饱读史籍，文笔恣肆，名噪乡里。三十一岁中举，因目睹官场的黑暗，便觉宦情扫地，从此不再图仕进。四十六岁在福州苍霞精舍为汉文总教习，讲授《毛诗》、《史记》。四十八岁时应杭州知府林迪臣聘，执教于杭州东城讲舍。五十岁时由杭州迁家至北京，先后在金台书院、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正志学校任教。教书之余，为商务印书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翻译西洋小说。林纾很关心国家民族的危亡，曾多次上疏言政，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他说：“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林纾适在北京，他当即与友人联名上书清廷，抗议日军侵占我国辽东半岛及台、澎等地。同时，他倾向新政，主张变法。1897年，林纾作《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全是讥讽旧习、感叹时事、倡导新政之作。像我们选译的《国仇》、《渴睡汉》、《兴女学》等，都是批判时政，抨击理学，提倡女权，兴办女学，宣传爱国思想的。郑振铎指出：“在康有为上书之前，他却能有这种见解，可算当时的一个先进的

维新党了。”^①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的“新政”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立宪运动宣告失败，林纾的思想也开始逆转，从进步趋于落伍。他在《畏庐诗存》序中说：“是岁九月，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从此以遗老自居，在民国以后的十馀年间，他曾九谒崇陵，祭奠光绪皇帝。对逊帝溥仪，则执臣子礼甚恭，并常常以“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自勉。对民国初年出现的各种新事物，他一概看不顺眼。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他就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疯狂地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了旧传统的殉道者。

林纾一生著译颇多，除小说、散文、笔记、诗歌外，还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林纾本身虽不懂外文，却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与人合作，先后翻译介绍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挪威、瑞士、希腊等国一百八十馀种小说，其中属世界名著的有四十多种，对当时文坛震动很大。

林纾对自己的古文成就颇为自负，对康有为只称赞他的译著而不称赞他的古文大为不满，以为其是“舍本逐末”。他说：“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② 林纾论文，早年虽然推崇唐宋，但也未曾菲薄魏晋。自从入京师大学堂，与桐城派马其昶、姚永概结为好友，遂为桐城派护法，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其古文风格长于叙事抒情，于闲漫细琐之处，时时杂以诙谐，曲折传情，生动活泼，清劲古朴，婉媚动人。林纾晚年名高，矜持

^①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

^② 见《林畏庐先生手札》。震川：即归有光（1507—1571），明代散文家。

异常，每为古文，常常经月不得一字，伤于蹇涩，不复如初之清劲婉媚了。

林纾创作的小说，大多以叙述时事为目的，拘泥于以“国事为经，爱情为纬”这样一个公式。大都是先取一实在故事，再虚构一、二个人物的爱情纠葛，加以敷演而成。同时，奇才、怪事、异梦的题材也比较多，多少有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如我们选入的《桂珉》、《水先生》。总的来说，林纾创作的这些小说艺术水平都不甚高，但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它的意义又是不能忽视的。它打破了章回小说的传统格式，是一个创新；同时记事翔实，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林纾论诗，主张“以自然为工，以感人为能”。清末论诗，几乎无不以宋之江西诗派为其宗主，林纾不附江西，并力排门户之见。他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玉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诗则学杜。惟不长于七古及排律耳。”^①可见他是博采众长，精心锤炼。林纾多才多艺，不仅能文，能诗，也能画。每作一画，必题诗一首于其上，是为题画诗。这是林纾诗作的一大特色。诗情画意，交相融合，相得益彰。

“译才并世数严、林。”^②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严复与林纾是两位可以比肩的人物。在诗文创作上，他们也显出了各自的风格和特色，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遗产，值得珍视。

① 见《林畏庐先生手札》。

② 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诗》。《庸言》第1卷，第7号。